

文章编号:1671-1653(2015)01-0001-07

“新常态”背景下中国金融生态 演进与银行业新发展

陆岷峰¹, 虞鹏飞², 汪祖刚³

(1. 江苏银行总行, 江苏 南京 210005;
2. 南京财经大学 金融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46;
3. 东方金诚国际信用评估有限公司, 江苏 南京 210005)

摘 要:“新常态”是对我国当前宏观经济形势和特点的新概括。中国银行业作为资金融通的重要中介机构,其服务对象和自身发展也出现了新的情况,所面临的金融生态出现了新的特征。在“新常态”经济背景下,金融发展模式、经营风险特点、业务结构等方面都出现了新的特点,这些特点构成了金融生态新的演进过程。金融生态环境的演进必然会对银行业发展产生根本性影响。因此,商业银行必须根据金融生态的“新常态”做全方位调整,明晰战略目标和战略举措,主动适应“新常态”的发展变化和需要,力促自身转型升级,谋求新发展。

关键词:“新常态”;金融生态;银行业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DOI** 10.3969/j.issn.1671-1653.2015.01.001

The Evolution of Financial Ecological and New Development of Banking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New Normal"

LU Min-feng¹, YU Peng-fei², WANG Zu-gang³

(1. Bank of Jiangsu, Nanjing 210005, China;
2. School of Finance, Nanji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 Economics, Nanjing 210046, China;
3. Golden Credit Rating International Co., Ltd, Nanjing 210005, China)

Abstract: "The new normal" is the new summary of China's current macro economic situa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As the main operation of social financing, China's banking is encountering a new situation in the service object and its development as well as new characteristics the financial ecology.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economic "new normal", new features in financial development mode and business risk characteristics have appeared. These features constitute a new financi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 The evolution of the financial environment is bound to have a fundamental impact on the banking industry. Therefor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new normal", China's banking must make a full range of adjustments in strategy, identify the strategic objectives and strategic initiatives and actively adapt to the "new normal" of development in order to serve the real economy better.

Key words: "the new normal"; financial ecology; banking

收稿日期:2014-10-20

作者简介:陆岷峰(1962—),男,江苏金湖人,江苏银行总行职员,南京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教授,博士后,主要从事宏观经济、商业银行、中小企业研究。

一、引言

经济的发展有其阶段性特点,而在其每个阶段的发展中都有着独特的规律和运行轨迹,同样也会形成阶段性的稳定均衡。从 1978 年改革开放开始,中国经济经历了 30 余年的高速增长,年均增速高达 10%。在这一阶段的发展中,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堪称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但是,这 30 余年的高增长并非是一帆风顺的坦途,20 世纪 90 年代亚洲金融风暴和 2007 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也使得中国经济的增长付出了惨痛的代价,结构失衡、环境污染、产能过剩等问题逐渐凸显。

2007 年全球金融危机造成国际金融市场上的震荡和恐慌,不少国家经济出现衰退,而中国经济在一系列刺激政策的作用下保持稳定高速增长。但是从长期来看,却容易造成经济的周期性波动。由于前期刺激政策的缓慢消化,快速增长所积累的风险逐渐凸显和释放,经济增速持续下滑,我国经济的发展正处于一段重要的战略机遇期。2012 年和 2013 年,我国 GDP 年均增长率仅为 7.7%,2014 年上半年更是降为 7.4%,这与 21 世纪初前 10 年年均 10% 的高速增长相形见绌。^①这种新周期中的中国经济被定义为“新常态”,即是指我国经济运行开始偏离前 30 多年的“旧常态”,正在向一个新的轨道上运行并逐渐形成一个新的均衡。

而金融业作为社会资金融通的主要运行者,在“新常态”背景下,其服务对象和本身的发展出现了新的情况,金融生态也出现了新的特征。但是,国内对于当前中国经济“新常态”的研究成果极少。而其中多数专家学者都试图从理论的层面来分析中国经济的“新常态”,而关于“新常态”对金融业态发展的影响以及对金融发展策略的探究领域涉及较少。张慧莲、汪红驹(2014)通过对中国经济新常态与美国经济新常态的比较分析,总结了中国经济增长减速、结构调整、要素供给等方面的新变化。^[1]刘元春(2014)认为,中国经济“新常态”实质上是一个从传统的稳态增长向新的稳态增长迈进的过渡期。^[2]万建民(2014)指出,“适应新常态”就是不要人为刺激,而要顺应经济规律,适应市场调整,保持一颗平常心。^[3]本文主要从“新常态”出发,对中国金融业态的环境进行深入分析,尤其是对金融的核心——银行业的生态

环境变化进行分析,从银行发展模式、风险管理理念、业务结构调整三个方面进行研究,得出经济“新常态”必然导致金融“新常态”,同样会产生银行业的“新常态”这一关键结论。据此对中国金融业的发展提出各项有益的措施建议以适应经济的变化及金融生态的“新常态”,并推动经济的发展。

二、经济“新常态”概述

(一)“新常态”的概念

作为近年才兴起的经济术语,“新常态”一词最早出现在第 40 届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它是美国太平洋基金管理公司总裁埃里安提出的,对 2008 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世界经济政治状态的一种概括性描述和预测。而在宏观经济领域,“新常态”是指经济、金融危机过后经历的较为漫长、痛苦的恢复过程。而对中国经济而言,“新常态”被赋予了新的含义。就字面意思来看,“新”意味着异于旧态,“常态”意味着稳定均衡。也就是说中国经济正逐步进入高效而稳定的中高速增长阶段。就当前经济形势的判断来看,中国经济正处于增长换挡、结构调整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三种状态相互叠加的时期。这种趋势性、不可逆转的发展状态说明中国经济进入转型的关键期,如何通过创新宏观调控思路和方式来培育经济发展的持久动力至关重要。

(二)“新常态”经济的基本特征

促成这种“新常态”的形成既有国际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环境的影响,又是旧增长模式无法适应当前经济发展导致潜在增长率下降的必然结果。面对日趋严重的国际经济形势,“新常态”经济呈现出明显有别于之前的趋势特征。

1. 经济增速新常态

“新常态”经济最基本的特征是从过去年均 10% 左右的 GDP 高速增长转变为如今 7%~8% 区间的中高速增长。^①经济增长换挡回落,是由于我国当前劳动年龄人口和资本积累率下降双重因素导致的潜在增长率降低的必然趋势——GDP 增速由潜在增长率决定,并围绕潜在增长率上下波动。^②这种经济增速是适度的,具有可持续性,但是并不一定具有稳定性。纵观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几乎所有发达国家在经历了经济的高速增长之后,经济增长率会直接过渡到中速增长阶段,很难维持在 5% 以上的较高水平。而中国的经济增速已经连续 11 个季度在

7%~8%的区间波动,这是由于中国经济地区发展不平衡以及政府主导型经济体制双重作用下的结果。因此,在这种不稳定的作用下,中国经济如何平稳地过渡到中高速增长的平台并保持持续发展是“新常态”经济的重要着力点。

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韩国与当前的中国一样,经历了从高速增长向中高速的过渡。在速度换挡期,韩国通过金融改革、企业改革、政府改革以及劳动力市场改革四个方面的改革成功地转入中高速发展阶段,并持续增长。因此,从韩国调整经济换挡的经验来看,推进中国经济向“新常态”过渡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全面的经济体制改革。

2. 体制改革新常态

纵观新中国成立至今65年的发展中,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经历了从计划经济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巨大转变。在“旧常态”经济时期,经济高速增长的情况下,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都能够通过增量调整手段来实现。无论是金融体制改革、分税制改革还是国企改革,都可以在经济高速增长所提供的宽松条件下顺利进行。而如今在“新常态”经济增速下滑的转折性时期,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的“全面深化改革”的任务则面临新的挑战,改革的推进受到极大的阻力。随着经济增速换挡的影响,传统的“增量调整”改革模式已不再适用。在经济偏紧的情况下,改革难以突破各种既得利益格局形成的重重障碍,也难完全把握其运行规律,改革所受的压力相对较大。因此,以金融体制改革、财政体制改革以及国有企业改革为主的经济体制改革步履艰难,是中国经济的另一“新常态”。

3. 经济结构新常态

“新常态”下,中国经济结构正发生着潜在的渐进式的转变,经济结构的全面升级和不断优化将成为中国经济抢占国际竞争制高点的关键。

(1)产业结构方面,产业主体逐步由第二产业让位于第三产业。2013年我国第三产业对GDP增长的贡献率高达46.1%,首次超过第二产业;而根据2014年上半年经济数据显示,第三产业较去年同比增长高达8%,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也升至46.6%。^①而相较于发达国家的80%以上服务业占比来说,中国服务业前景还是相当广阔的,未来一段时间,第三产业比重上升将是长期趋势。这也预示着中国经济对于工业增长的过度依赖性

将逐渐降低,一个新的增长时代即将到来。

(2)需求结构方面,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内需拉动,需求主体逐步由投资需求让位于消费需求。2012年,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投资,这是自2006年以来首次出现的。2013年中国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50%,而到2014年上半年该指标已达到54.4%,拉动GDP增长4个百分点,需求结构中投资下降、消费上升的趋势越来越明显。^②

(3)动力结构方面,要素与投资驱动的结构逐步向创新驱动转变。由于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得益于人口、资源、环境等要素的强力投入,与此同时,资源消耗过快、环境污染严重等问题也逐渐凸显。随着中国经济逐渐进入“新常态”,促进经济快速增长的比较优势——劳动力人口也在悄然变化。据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自2012年劳动力年龄人口比上年减少345万,2013年劳动力年龄人口比上年减少244万。^③这说明,过去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开始上升,仅靠资本的投入难以支撑经济的长期高速增长。因此前期中国经济传统发展模式中人、力、资源粗放式投入已不再能适应当前经济的持续进步,必须将发展的动力由要素、投资向科技创新转移,努力提高劳动生产率。2012年,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占GDP的比重达1.98%,2013年更上升为2.09%,创新型国家的建设取得显著效果。^④

(4)就业与收入结构方面,就业更充分,收入更均衡。经济增速换挡回落,我国的就业形势却更加充分,这与“经济增长与就业同向变动”的传统理论相悖。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我国经济增速切换到了7.5%左右的中高速,城镇新增就业却始终保持着逐年增加的态势。2012年新增1266万人,2013年新增人数达1310万。这是由于,在经济总量扩大的基础上,GDP增加吸收就业的能力更强。同时,在产业结构优化的前提下,服务业快速发展拉动更多的就业量。另外,改革逐步释放的红利也在一定程度上拉动就业的增加。而在居民收入方面,随着“新农村”建设、城镇化、工业化步伐的不断推进,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更加优化,差距逐渐缩小。2012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率为9.6%,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率为10.7%,都超过了当年7.7%的GDP增速。2013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7.0%,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

9.6%。2014 年上半年,城镇居民人均收入是农村居民人均收入的 2.53 倍,相较于 2009 年的 3.33 倍的差距有明显的减少,城乡差距逐渐趋于合理化,收入更加均衡。^⑤

4. 经济政策新常态

当前我国宏观经济政策告别旧常态下的调控与刺激,逐渐转向稳定增长、优化结构、预调微调、防范风险的宏观审慎政策,保持经济增长的持续性与稳定性,坚持区间调控,注重深化改革,简政放权。即便面对如今经济增速下滑的压力,也只需要采取“微刺激”的手段来维持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

综上所述,“新常态”经济就是与传统的低效率、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粗放增长模式相对的一种高质量、低成本、可持续的中高速增长阶段。正确认识“新常态”对未来宏观经济政策导向有着决定性意义。

三、经济“新常态”对金融生态环境的影响

(一)金融生态环境的概念

“新常态”的中国经济是全球经济环境与国内经济体制改革双重作用下的必然趋势。而随着 GDP 增速的持续放缓、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经济结构的全面升级以及经济政策的宏观调整,中国金融生态环境也正发生着巨大的转变。

金融生态环境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创新概念,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2004)第一次系统地生态学概念与金融相结合,创造性地提出用生态学的自然科学方法来研究金融发展的社会学问题。^[4]金融生态环境指的是与金融业生存和发展相关的所有因素的总和,其中包括政治、经济、文化、资源、人口等,它是金融业合理运行的基础。一个和谐、可持续发展的金融生态环境有利于金融业的可持续发展,可以为社会创造出更多的价值与财富。

(二)经济“新常态”对金融生态的影响

经济是金融赖以发展的基础,金融是经济运行的核心。经济发展作为金融生态环境的一个重要方面,对金融业的发展方向起到了重要的指引作用。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中国金融业的发展也将逐步向“新常态”时代迈进,金融生态环境也必将改变。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新常态”对金融领域的影响远比对实体经济领域的影响更

为复杂。从影响金融生态环境的各个方面来看,经济是基础,市场是金融交易最重要的媒介,而政策制度是保障金融业正常运作的规则。因此,可以从经济基础、金融市场和政策制度三个主要方面来考察“新常态”经济对金融生态环境的影响。经济增速的放缓与经济结构的升级改变了金融生态的经济基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又推动了金融市场的发展,而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对金融政策制度也产生了重塑的作用。

1. 经济增速放缓加剧了金融风险

受潜在增长率下滑的影响,中国经济正处于经济增速的换挡期,经济增速放缓已是不争的事实,这必然导致中国金融业各类价格的换挡。不良贷款增加、不良贷款率上升以及信贷增速的放缓,这些都是经济增速回落情况下银行业金融机构信用风险增加的必然结果。据中国银监会最新的数据显示:截止 2014 年 6 月,中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高达 6 944 亿元,连续 11 个季度增加,不良贷款率也升至 1.08% 的水平,较今年年初增长了 0.08 个百分点,激增 1 023 亿元,超过去年全年新增规模。^⑥在经济增长乏力的情况下,企业经营更加困难,利润压缩甚至亏损增加导致银行难以收回贷款,信贷增速也趋于下滑,给银行的业绩带来了极大的冲击。

2. 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推动金融业态的重构

经济是金融发展的基础,经济结构的调整必然也会带来金融业态的转型。产业结构的优化,服务业占比持续上升,给商业银行带来更大的潜在客户群。居民收入及消费需求的显著增加给商业银行带来了极大的消费信贷发展的空间。消费信贷业务,尤其是适应个人消费者的零售信贷业务的发展是各大商业银行抢占市场的重要手段。从经济发展的动力结构看,创新型产业的发展也促使商业银行优化信贷投放结构,更加关注具有成长性新兴产业以及小微企业的发展,加快推进银行转型升级的步伐。

3. 经济体制改革促进金融资源配置的市场化

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是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主线,有助于释放经济活力,提高资本效率。因此,在微观领域内,金融资源的配置更加市场化。在市场机制的调节下,商业银行的信贷资源逐渐从房地产行业、大型国有企业等产能相对过剩的行业流向经营效益高、发展潜力好的新兴产业,更加注重小微企业的信贷可得性,

加大对“三农”的信贷支持力度,盘活存量资金,促使金融市场配置资源的效果达到帕累托最优。

4. 宏观经济政策转变重塑金融政策

“新常态”背景下宏观经济政策再定位,摆脱先前的经济“强刺激”,逐步转变为预调微调为主的新型宏观调控模式。因此,金融政策也要服从于新政策要求,根据当前经济波动重新定位。逐步转变“旧常态”下凯恩斯主义的需求导向型金融模式,将新结构主义融入到金融政策中,加快金融市场预期重构的步伐。

因此,在告别了不协调、不平衡、粗放式的“旧常态”经济模式之后,“新常态”经济应运而生。毫无疑问,中国金融业进入中高速增长“新常态”时代的趋势也将不可阻挡。在“新常态”背景下,金融业必须根据变化了的“旧常态”和“新常态”的要求,对过去不再适应当前经济发展的战略进行全面调整,才能保证发展方向的科学性和可持续性。也只有坚持金融服务的内涵式发展,重视金融创新,才能保持自己旺盛的生命力,在激烈的竞争中赢得更大的发展空间。

四、经济“新常态”背景下金融生态演进

受经济“新常态”的影响,中国金融生态环境正发生着剧烈的变化,金融“新常态”正缓缓掀开她演进的面纱:金融发展模式、风险管理、业务结构等方面都出现了新的特点,这些特点构成了金融生态新的演进过程(如图1所示)。金融生态环境的演进必然会对银行业发展产生根本性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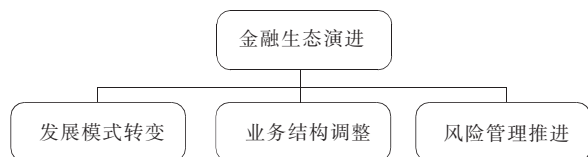


图1 经济“新常态”背景下金融生态演进图

(一) 发展模式发生变化

“旧常态”下的金融发展观念实质上是一种顺周期发展观念,经济的快速增长使得实体经济规模和广义货币扩张的速度加快,金融行业尤其是银行业各类业务自然增长,行业规模呈扩张式发展。但是这种发展更多的表现是粗放式的扩张,不但加剧了宏观经济波动,而且由于流动性、违约和价格波动等三重风险的影响制约了金融业的健

康发展。因此,在“新常态”经济增速放缓的背景下,货币政策收紧、杠杆缩减等问题的出现,导致银行存款成本上升并大量收缩同业业务,银行面临更大的流动性问题。“规模冲动”和“速度情节”等发展模式也不再适应当前中国金融的发展要求,以规模扩张为主的粗放式发展亟待改变。

(二) 业务结构调整要求发生变化

“新常态”下,经济增速的放缓导致结构调整要求发生变化已是大势所趋。经济结构调整必然加快金融领域结构转型的步伐,中国银行业经历了多年的高速发展,面临当期经济的新变化,传统的业务结构越来越不适应银行发展要求。利率市场化改革加速推进、金融脱媒程度的不断深入以及互联网金融的迅猛发展都使得商业银行传统业务结构发生不小的变化。利率市场化下,银行的存贷款利差受到挤压,银行盈利能力受到威胁。因此,中国银行业单一的存贷款业务结构亟待调整。金融脱媒程度不断加深,直接融资市场的发展也越来越完善,这也给商业银行的发展给来更大压力。另外,互联网金融的兴起对商业银行结构调整的挑战主要来自于渠道方面。而互联网金融相对于传统银行业务最大的优势在于,运用互联网技术与移动通信技术更加高效、便捷地开展各类金融业务。因此,商业银行传统业务结构将向流程化、智能化、便捷化等转变。

(三) 风险管理理念发生变化

经济扩张时期,商业银行在发展业务与控制风险之间的会有更大的选择空间来使得二者达到平衡,风险过大、盈利较少的业务大多被风险低、盈利高的业务所取代。银行大多是厌恶风险的,往往采用的是被动式、单线条的风险管理方式。而在“新常态”下的经济增速换挡过程中,银行业面临更大的风险管理压力。经济下滑,企业经营更加困难,商业银行所偏爱的风险低、盈利高的行业少之又少。一旦国有企业、政府金融风险增大,商业银行传统的“风险零容忍”理念将严重阻碍其业务发展。因此,在这种大环境下,商业银行树立新的风险文化,从风险厌恶理念转变为主动经营风险理念,加快推进风险管理转型刻不容缓。

五、金融生态演进下银行业发展新战略

中国银行业所面临的金融生态环境已呈现出新的变化和特点,并形成“新常态”。这将对中

银行业的经营理念、客户空间、业务模式、产品形态、风险状况、发展模式等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银行业要立足当前、着眼长远,明晰战略目标和战略举措,从六大方面进行战略再定位,主动适应“新常态”的发展变化和需要,力促自身转型升级,谋求新发展。

(一) 战略目标

商业银行转变发展战略是“新常态”下市场需求推动的必然结果,转变发展战略思路是商业银行适应“新常态”,培育发展新动力的根本途径。对于商业银行而言,长期以来保持的“旧常态”条件优势已经不复存在,商业银行要调整战略发展策略:以转型寻找到新的优势,不断创造新的金融工具,提升金融服务技术水平。坚持问题导向,从制约银行业发展因素以及主要业务领域入手,围绕适应“新常态”培育新业务、发展新动力展开,形成转型和发展的良性互动,从数量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变;从低信息化、高人工化向高信息化、低人工化转变;从以利润为中心向以客户为中心转变;从风险激进型向风险稳健型转变;从同质化竞争向差异化创新转变,最终实现粗放型增长模式向内涵式发展模式转变的战略目标。

(二) 战略措施

1. 确立新的经营理念,构建内涵式发展模式

在“新常态”多重约束条件下,传统商业银行以规模的快速扩张的经营理念即将成为历史,而注重内涵和效益的增长方式将成为未来发展的主旋律。随着金融服务需求的多元化、精细化、专业化,银行业要抓住新的机遇期,审时度势,结合自身规模、人员和区域等优势调整自己的经营理念和发展模式,着力打造新常态下的新的比较优势、新的市场竞争力和新的利润增长点,推动新常态发展战略稳步落实和持续发展,增强发展的硬实力。商业银行要确定新的经营理念,构建内涵式发展模式,一方面需要由“旧常态”下以规模扩张向“新常态”下质量提升转变;另一方面需要由“旧常态”下以利润为中心向“新常态”下以客户为中心转变。

2. 树立新的风险文化,切实推行全面风险管理

在“新常态”背景下,金融转型和结构调整所产生的新增风险与“旧常态”存量风险的相互叠加改变了传统风险管理思维。与此同时,互联网金融的迅猛发展所产生的网络技术风险增强了传统

风险的传导和外溢。为适应“新常态”趋势,商业银行亟需树立新的风险文化,建立包括流动性风险、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网络风险、技术风险等的识别、计量、评估、监测和对冲一整套流程,切实推进全面风险管理。一方面,以培育风险文化为导向、以强化风险意识为支撑,通过培训和教育,积极塑造全体员工的风险管理理念、风险控制行为、风险道德标准,形成全行上下风险管控的新文化;另一方面,以大数据、云计算为技术依托,完善全面风险管理机制,找准风险管理的着力点,实现风险管理的模型化、系统化、流程化。

3. 持续优化业务结构,契合增长新动力

经济“新常态”导致增长方式的转变,带来第三次产业和行业的调整,以及各生产要素投入的重新组合配置。“新常态”下消费金融、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与技术性产业正成为增长新动力。银行业需审时度势,发挥自身优势,通过持续优化三大业务结构以契合增长新动力,有效应对实体经济结构性的变化。一是优化资产业务。资产管理、资产托管、资产证券化、盘活资产存量等成为中国商业银行“新常态”下的热点,而非传统的单一信贷资产的经营。在优化和丰富资产业务的同时注重不良资产的核销和处置,提升整体资产质量。二是精细负债业务。随着直接融资、互联网金融对资金的分流以及银监会对银行存款偏离度的考核,被动的负债管理已无法满足“新常态”的需要,必须通过主动负债管理实现具有自主、稳定、可控的资金来源渠道,切实解决资金、资产的期限和结构错配问题。三是拓展中间业务。商业银行的收入结构需要从高度依赖利差,逐渐转向更多依赖中间业务转变。通过以上三大业务结构的优化调整来避免金融“剥削”实体经济利润和金融资源“空转套利”等现象,切实服务于实体经济。

4. 激发金融创新动力,突破传统制度障碍

“旧常态”下中国银行业凭借旧的制度红利实现了长足地发展,同时也出现了以服务实体经济为幌子的“伪金融创新”现象,导致资金空转。这些“伪金融创新”的实质是与我国“新常态”发展相背离的。伴随着“新常态”的演进,金融市场将逐步由金融抑制向金融放松转变。要提高金融中介机构的资金配置效率,必须激发金融创新动力,突破传统制度障碍,以软实力利用新制度红利,在“新常态”下形成商业银行新的利润增长点。具体而言,银行业金融机构借助金融市场化改革东风

努力消除打着服务实体经济“幌子”的“伪金融创新”,以有利于降低融资成本、增加融资便利性、减少金融风险为创新导向,切实从金融工具、金融产品、金融服务、金融制度、金融业务等方面进行创新。商业银行只有通过金融创新来突破传统制度障碍,才能真正落实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本质要求。

5. 大力发展互联网金融,以科技手段助推转型升级

移动互联网技术渗透并冲击传统金融业是“新常态”下银行业必须面对的现实。商业银行传统的低信息化、高人工化投入无以为继。随着互联网金融的大力发展,其在销售终端和虚拟渠道方面冲击和颠覆着商业银行传统的组织管理模式和业务流程模式,凸显出传统银行业粗放型经营问题。互联网和金融的相互融合将是“新常态”下银行业发展的既定趋势,以互联网技术助推传统银行业转型升级是“新常态”下中国银行业发展的科学路径。一方面,深化组织管理模式再造,改善运行效益。商业银行目前仍以物理网点的逐层布局、人力资源的大量投入、管理部门的繁冗设置的组织管理模式实现粗放型发展。在金融互联网背景下,通过互联网技术实现金融服务无网点化、消费支付移动化、业务模式垂直化,从而有效改善运行效益。另一方面,推进业务流程再造,提高业务效率。随着互联网技术在金融业的广泛运用,它

整合了银行服务流程和内容,并改变了银行的运作方式,对商业银行传统业务流程产生了深远影响,倒逼其进行流程再造。新形势下,商业银行要充分利用互联网思维通过业务层面上的操作流程的优化与改善,从而实现银行的业务流程再造以适应未来互联网金融发展的需要。

6. 强化队伍建设,提升全员服务新质态

“新常态”背景下,以客户为中心是银行业发展的内核,这将对金融人才队伍提出更高的要求。未来的银行业竞争将是服务水平、服务能力、服务质量的竞争。只有不断强化队伍建设,全面提升全体人员服务质态,才能顺应“新常态”的内在要求。一方面,通过激励约束机制提高全员的复合化水平,满足客户多元化的服务需求;另一方面,树立以客户为中心的服务理念,切实提升金融服务质量,以服务质态的提升来增强客户黏性,有效增强银行之间的服务竞争力。

经济增速换挡回落、体制改革步履艰难、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经济政策转型调整,中国经济在经历了改革开放30多年的高速增长后,逐渐走向“新常态”发展道路。经济的新常态必然导致金融的新常态。银行业只有根据变化了的“旧常态”与“新常态”的新要求对过去不适应经济发展的要素提早进行全方位的战略部署和调整,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保持旺盛的生命活力,从而推动实体经济的持续发展。

注 释:

①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

②潜在经济增长率是指一国(或地区)经济所生产的最大产品和劳务总量的增长率,或者说一国(或地区)在各种资源得到最优和充分配置条件下,所能达到的最大经济增长率。这里讲的资源包括自然资源、人力资源、技术和管理,还包括制度安排和经

济政策。

③数据来源:《201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④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2~2013年)。

⑤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9~2013年)。

⑥数据来源: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

参考文献:

- [1]张慧莲,汪红驹.中国经济“新常态”[J].银行家,2014,(6):11~13.
[2]刘元春.“新常态”需除“旧教条”[N].光明日报,2014-06-23

(11).

- [3]石建民.新常态与平常心[J].中国企业家,2014,(11):3.
[4]周小川.法治金融生态[J].中国经济周刊,2005,(3):11.